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赵 岚

摘 要: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关键词: 英国;国际联盟;“九·一八”事变

1931 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重大的国际政治危机。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英美列强和国际联盟的干涉,因而英美列强及国联如何对付这场危机,对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英国不仅是在中国既得利益最多的西方大国,而且还是国际联盟的实际操纵者,它对这场危机采取何种对策,更显得举足轻重。

一、英国与国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当一场危机发生时,非当事国往往依据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及其与本国的利害关系作出反应,其中利害关系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英国对“九·一八”事变作出反应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英国在华的扩张活动集中在关内,它在东北的利益微不足道。日本侵占东北对英国在华的直接利益没有多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对“九·一八”事变不会作出强烈反应。最初英国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对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持同情态度。英国认为,日本人口多、资源少、面积小,必然要向外扩张。“如果禁止日本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移民,那么认为它不会向黄种人的某个国家(如中国)扩张是缺乏根据的。”^①多年来,英国一直认为,满洲注定要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它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感到吃惊。另外,由于 20 年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曾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以至它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把事变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中国的排外,而没有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和称霸远东的角度认识事变的严重性。英国驻日本大使林德利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断地破坏日本的地位”,日军的行动“旨在迫使中国政府解决许多在满洲长期存在的争端”^②。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也认为:“日本确实有理由对中国不满,尽管它的行动与国联的原则是相违背的。”^③

①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46.

②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143.

③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8. London: H. M. S. O, 1960, No. 769.

英国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日军侵占东北可能对英国有利。1931年11月6日,陆军元帅威廉·伯德伍德给西蒙写信说:“你只能帮助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我知道,当日本藐视国际联盟时,这样做听起来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是,1. 日本有很大的不满。2. 它不久必然向某处扩张——老天保佑(或者纵容)它向那里(指中国东北——引注)而不是澳大利亚方向扩张。3. 它在满洲充分确立的存在,意味着对布尔什维主义扩张的真正封锁。”^①林德利也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显然有可能有益于英国在华的利益。”^②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受其内政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国内局势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英国国内经济危机达到高涨。8月28日,英格兰银行为对付危机,发放信贷8000万英镑,计划供一年周转,实际上到9月19日已用完。9月21日,英国被迫宣布放弃金本位。受经济危机影响,9月15日,英国大西洋舰队的部分水兵爆发了起义。9月19日,财政大臣张伯伦谈到局势时认为,“世界一片混乱”,“这是恐怖的一周”。第二天,首相麦克唐纳说:“我们现在陷入了可怕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考虑”。^③的确,对英国政府来说,对付经济危机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相比之下,远东危机则显得无足轻重。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个多月内,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英国内阁的议事日程,而仅由英国外交部在国际联盟的框架内应付。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将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联,希望国联出面干预。第二天,国联理事会讨论了远东危机。日本代表芳泽谦吉颠倒是非,把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为日军的侵略行动辩解,还要求中国依据1915年签订的“21条”,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英国代表对此持同情态度。当天理事会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决议,同时呼吁中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为了防止国联仅仅依据盟约条文谴责日本,英国从一开始就操纵国联的活动。9月23日,英国代表塞西尔在理事会秘密会议上说:“满洲离日内瓦很遥远,联系困难……建议理事会谨慎行事。”两天后他又说:“争端问题是双边问题,而不应由理事会处理,除非援引盟约第15条。”^④在英国操纵下,国联理事会于9月30日通过正式决议,要求中日双方“速行恢复两国间通常之关系”。

这种不痛不痒的决议丝毫不能约束日军的扩张。10月8日,日军大举轰炸锦州,大有向关内进攻之势,这才使英国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如果日军向关内进攻,将直接威胁英国在华的利益。其次,如果让日军的行动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国联的威信和英国的形象,破坏华盛顿体系所维护的中国和远东的现状。10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指出:“从后果看,我们战后构造的整个和平结构面临着危险,……如果现在国联机构和凯洛格公约失去作用,我认为它们及其缔造者将遭受挫折,其程度是难以预料的。”^⑤此外,日军对一个国联成员国的公然侵略,引起了许多中小国联成员国的愤慨,有可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若果真如此,将使英国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基于这种考虑,10月24日,它操纵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之前将军队撤回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然后由中日直接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日本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只有道义力量。

日本否决决议及其拒不撤军,使国联许多中小成员国发出了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声。这种动向使英国极为不安。在它看来,由于美国、苏联不是国联成员国,其他成员国力量有限,国联若制裁日本,主要任务势必由英国承担。“解决太平洋地区发生的问题的责任,在国联成员国中几乎全部落在英国身上”^⑥。如果日本报复,英国将首当其冲。无论如何,英国决不会仅仅为了主持正义而冒日本报复的危险。退一步说,即使英国心有余,此时还面临着力不足的矛盾。在远东危机中,当英国逐渐意识到日本扩张的威胁时,却痛苦地发现,它自己在远东的防务能力不足以应付同日本的战争。1931年8月31

①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177.

②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8. London: H. M. S. O, No. 509.

③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90.

④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8. London: H. M. S. O, No. 514.

⑤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8. London: H. M. S. O, No. 603.

⑥ 《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上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6页。

日,英国内阁就对远东防务得出结论:“如果爆发大的战争,海军将无力完成其任务”^①。1932年1月26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顾问、远东问题专家普拉特说:“在目前情况下,这里可能引起日本海军横行霸道,就象日本陆军在满洲一样,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如果我们起来与日本对抗,我们的利益将蒙受损失。”^②

为了防止国联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一直忙于应付经济危机而无暇顾及远东问题的英国内阁,不得不于11月11日开会讨论远东危机。会议决定派外交大臣西蒙出席将于11月16日复会的国联理事会会议,西蒙在国联应遵循如下方针:“应支持国联。内阁认识到,盟约第16条所规定的制裁是不合适的,在目前情况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为了国联本身,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呼吁从援引盟约第11条转到第16条。……一句话,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避免有威胁暗示。”西蒙对这一方针作了如下概括:“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的自己的职责,不要寻求转向盟约第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③由此可见,英国政府与其说关心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毋宁说担心自己被卷入同日本的冲突中去。如果不是国联出现了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声,“九·一八”事变何时才能提上英国内阁会议的议事日程还很难说。

为了阻止国联制裁日本,英国还采取了如下措施:1. 继续为日本辩护。在11月末至12月初的国联理事会会议上,英国代表有意识地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塞西尔说:关于正在恶化的远东局势,很难说应谴责哪一方。2. 明确表明英国反对制裁的立场。塞西尔指出:“让我们永远记住,国际联盟掌握的主要武器是世界舆论的支持。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落在舆论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它的前面。”3. 对国联封锁日本不利的情报。国联理事会曾要求各成员国向国联提供有关远东危机的情报,英国却把对日本不利的情报扣压下来。11月13日,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对此解释说:“我们得到的情报,绝大多数无疑是非常不利于日本的。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披露它们是不明确的。”由于英国的阻挠和操纵,11月16日复会后的国联理事会会议,没有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

英国虽然成功地阻止了国联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却未能阻止日军在东北的进一步扩张。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此时,国联及英国在远东危机问题上开始显得无能为力,这既有损于国联的威信又有损于英国的形象。日本提出,由国联派调查团前往“满洲”调查。早在9月21日,中国曾要求国联派调查团调查事变的真相,英国代表最初表示支持,可当时因日本反对,英国及国联便拒绝了中国的建议。现在,日军已占领东北大部分地区,日本却主动要求派调查团,目的在于阻止国联制裁日本,拖延时间进一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诚如国联官员华尔脱斯所说:“两个月前原会受到欢迎的这种计划,现在包含着接受无限期延长的显然违反盟约的一种情势。”^④为了使国联不至于显得无所作为,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派调查团的决议。显然这是一种迁就和姑息日本、维护国联面子的行为。日本报纸评论说:“这个调查团是给中国一付安静剂,给所有其他国家一个脱身的后门。”^⑤英国《泰晤士报》承认,调查团将挽救不了中国,或许只能企图挽救国联的面子。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了锦州,至此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占领。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发出了著名的“不承认”照会。此前,他曾于1月5日召见英国驻美大使林赛,向他介绍了照会的内容,表示希望英国能仿效美国的行动。这是一种由英美联合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建议,而英国却认为,此举有招致日本报复的危险,它既不相信美国会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更担心一旦引起日本报复,美国会让英国首当其冲。西蒙说:“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与美国一起行动,他们会让我们打头阵,首当其冲。”^⑥因此,英国拒绝了史汀生的建议。鉴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的消极政策,以及20年代以来英美之间的复杂矛盾与互不信任,英国对美国远东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英国公开地拒绝了史汀生的建议。1月9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公报说,日本政府已于

①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71.

②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8. London: H. M. S. O, 1960, No. 120.

③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189.

④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页。

⑤ 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13页。

⑥ C. A. MacDonal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 Oxford: St. Anthony's College, 1981, p. 20.

1931年10月13日和12月28日两次声明,愿意在满洲遵守门户开放政策,“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仿照美国照会的方针向日本提出任何照会。”^①1月11日,作为英国政府喉舌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政府拒绝史汀生的建议是明智的,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并非英国外交部当前的任务,而“此种完整自1922年以来,已不存在,虽至今日尚未存在。”^②这样一来,英美之间的分歧便公开地暴露在日本面前。

英国的这种作法无异于向日本公开表明,此次不存在英美联合对日问题,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因为日本最可怕的就是西方大国联合对日,像以前三国干涉还辽和华盛顿会议迫使它退出山东那样。在英国的纵容下,日本的侵略气焰更形嚣张。1月16日,它在给美国的复照中,用《泰晤士报》的口吻说:“日本政府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远东政策的主体。遗憾的是,由于整个中国的局势不稳定,这一政策的成效已显著下降。”^③后来,英国人自己也承认。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普拉特说:“公报自然是一大错误,对此找不出任何真正的借口……1931年至1932年,外交部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它没有获得史汀先生的信任和友好”^④。另有一些人也认识到:“日本正是由于英美的分歧而从中渔利。”^⑤

二、“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远东政策的积极变化

日军占领东北后,开始策划在东北成立的“满洲国”。为了掩护其公开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就与列强的利害关系而言,上海与东北的最大不同在于,东北传统上属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上海则是英美在华的利益中心。1931年,英国在华总投资19796万英镑,其中13000万英镑集中在上海^⑥。上海国际租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金融和工业中心,主要由英美列强控制。因此,日军侵略上海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此时,英国更多地是从日本称霸远东的角度认识日军入侵上海的。英国的军政官员仍对“一·二八”事变的发生普遍感到忧虑。1932年2月1日,普拉特说:“如果日本继续不受到制止,英国将不得不从远东全面撤退。……而从远东撤退将可能是从印度撤退的序幕。”^⑦范西塔特甚至认为,如果英国从远东撤退,英帝国的苏伊士运河以东部分可能会全部丧失。

基于这种利害关系,英国对“一·二八”事变作出了迅速、积极和强硬的反应。1月29日,日军轰炸闸北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立即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英国驻沪总领事也遵照政府指示,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了抗议。1月31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4天,英国内阁就召开会议,讨论上海问题,决定增派两艘巡洋舰到上海,成立内阁远东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远东危机。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改变了姑息日本侵略活动的态度。当时,英国驻沪的一些商业团体以及总领事布伦南对日军的侵略活动仍然持姑息和纵容态度,主张支持日军的行动。此时英国政府却很谨慎,没有贸然迁就这种主张。西蒙在给驻华公使兰普森的电报中指出:“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中日之间保持不偏不倚。这种方针最有利于维护在国际租界内的英国侨民的真正利益……设想站在反对中国的人一边而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看法。”^⑧英国外交部的普拉特和韦尔斯列还认为,中国单纯的反日运动可能会有益于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指示布伦南,要他设法阻止日本援军在国际租界登陆。由于英、美联合施压,迫使日本援军在租界以外的地点登陆,使日军登陆失去了国际租界这个有力的屏障。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英国远东外交的突出变化是比较重视与美国的协调一致。早在1月25日,史汀生曾向英国建议,在未来远东局势的演变中,英、美两国应加强合作。最初,英国政府对此未置

① B. B. Scofield. *British Sea Power, Nav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Batsford, 1967.

② 史汀生:《远东之危机》,正中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五年,第85页。

③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1, Washington, 1943, p. 77.

④ John T. Pratee.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N. 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1. p.; U. S. G. P. O., 218.

⑤ B. B. Scofield. *British Sea Power, Nav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Batsford, 1967, p. 119.

⑥ N.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 16.

⑦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9, No. 238. London: H. M. S. O., 1965.

⑧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BFP), Ser. 2, Vol. 10, No. 51. London: H. M. S. O., 1965.

可否。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英国答复美国,表示愿意接受史汀生的建议。同一天,英国在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时,请美国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也向日本提出了抗议。1月31日,英国决定向上海派巡洋舰时,又请美国仿效。美国便决定把它驻马尼拉的亚洲舰队调往上海。两国舰队到达上海后,注意加强联系、协调行动。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美对如何解决远东危机仍有分歧。美国曾代表西方列强提出调停中日争端的5项条件,其中第5条是:“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①,即把“上海事件”与“满洲问题”联系起来一道解决。日本坚决拒绝这一条。英国认为,美国的这一主张是不明智的,日本接受前4个条件,“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英美的调停活动不应坚持把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联系起来。但此时,英国吸取一个月之前的教训,没有公开表明与美国的分歧。英国内阁远东委员会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与美国密切行动”^②。西蒙致电史汀生时,没有坚持放弃第5条,只是暗示:“对问题的重新考虑或许是必要的”。

不过,英美之间的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当英国觉得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协调行动会招来危险时,便自行其是。在英美最初的调停活动失败后,史汀生建议:英美发表一项坚决维护《九国公约》的联合声明,以表明两国的坚定立场。2月15日,英国内阁远东委员会讨论了史汀生的建议,许多阁员认为,美国人是靠不住的,它“太接近于对日本进行起诉”,它会让英国在日本的报复中首当其冲。会议决定,由国联理事会起草一份报告,分别提到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用以指导国际联盟大会,既防止国联大会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又以此为理由拒绝单独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于是西蒙答复史汀生,介绍了国联理事会即将通过的声明,以应与国联保持一致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建议。2月16日,英国便操纵国联理事会对日本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它遵守国联盟约,不要破坏其他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实际上是暗示日本应对远东危机负主要责任。遭到英国拒绝后,史汀生将拟好的声明以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的公开信的形式,于2月23日发表。这自然不具有以英美联合声明的形式发表所能产生的威慑力。4月份,史汀生在日内瓦见到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时说,英国人又一次“拆了美国的台”。

“一·二八”事变之前,在日军侵占东北问题上,英国一直让国联出面调解,而它自己则在幕后操纵,始终不肯走到前台来,一直没有单独采取行动。“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在继续利用国联的同时,还迫不及待地直接出面,在中日之间积极耐心地展开调停活动。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兰普森正准备回国述职,在得知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赶往上海。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英、美驻沪总领事就开始了调停活动。事变初期,中国军民顽强抵抗,给侵沪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向上海增派大批援军。在此期间,英国与美国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调停活动,终因日军态度顽固,无意停战,调停工作陷入失败。英国外交部由此得出结论:日军不在战场上获胜是不会接受调停的,“即使中国同意我们进行干涉,日本仍将找到某种借口进行战斗”^③。英国准备从上海撤走一些英国妇女和儿童。直到3月初,日军发动了新的进攻,中国守军因得不到南京政府切实有力的支持,被迫撤退。此时,兰普森便抓住时机,再次积极进行调停,终于促成中日双方于3月14日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在随后的停战谈判中,中日双方意见分歧很大。兰普森在其中做了大量的调停工作,1932年5月5日终于促成中日双方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基本上平息了。

《淞沪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我们还应看到,日军入侵上海与入侵东北的结果毕竟有所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日本入侵上海的初衷与入侵东北不同,主要目的是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其二,中国军民对侵沪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付出了惨重代价;此外,还应看到,英、美的积极干涉也起了一定作用。从英国方面看,“一·二八”事变期间,它的远东外交明显地趋向积极主动,注意尽可能与美国协调一致,对日本形成了一定压力。日本担心英美紧密合作,并鼓励中国积极抗日,使日军不仅不能在上海立足,而且会丢掉东北。“如果在各国中孤立

①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②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251.

③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99.

了,是否会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真是令人不胜担心。”^①苏联史学家茹科夫认为,“一·二八”事变平息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结果”^②。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远东外交的变化,不仅程度有限,而且仅局限于上海问题。从远东危机的全局来看,则并非如此。事实上,“一·二八”事变是1931至1933年“九·一八”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它的发生,远东危机由一个东北热点变成了东北和上海两个热点,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由于两地与英国利害关系不同,英国只关心平息与它利害关系密切的“一·二八”事变,反对把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联系起来一道解决,甚至一度想通过牺牲中国东北换取它在上海的利益的安全。由此表明,英国远东外交的积极变化有很大的局限性。从远东危机的全局来看,它正好满足了日本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分裂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的需要。因此,30年代英国对法西斯国家推行的、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来维护自身主要利益的绥靖政策,最初就是在远东危机中形成的萌芽。

三、英国和国联的“不承认”政策

“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加紧策划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这是日本侵华的新步骤。最初,英国只顾平息“一·二八”事变,它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把东北与上海两地问题联系起来一道解决,对“满洲国”的成立没有直接作出反应,只是让国联大会于1932年3月11日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决议。

“一·二八”事变平息后,“满洲国”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成为英国远东外交面临的中心问题。虽然东北与英国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大,但“满洲国”的成立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公然破坏,是对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公然践踏,它使华盛顿体系所维持的中国和远东现状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重大变化。总之,它涉及的是英国在华和整个远东的实质性的、长远的利益。要维护英国在华和在远东的根本利益,就要维护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中国和远东的现状,就不能让日本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侵略活动任其发展下去。为此,必须设法解决日军一手制造的“满洲国”问题。

不过,东北本身与英国的直接利害关系毕竟没有上海那么大。因此当注意力重新回到东北问题上来时,英国不再像“一·二八”事变中那样积极主动地直接出面干涉,而是重新把国联推到前台,自己退回到幕后,操纵国联的活动。

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时,日本从策略上考虑,暂时还没有承认“满洲国”,但随时有可能宣布正式承认,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平息后。如果日本正式宣布承认,必将给解决这一问题增添新的障碍。为此,英国首先劝阻日本承认伪满。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作出了承认伪满的决议,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于6月22日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有田八郎,向他表示说:“满洲独立这种事本身,虽还不能马上说就是违犯九国公约的,但即便是稍微支持一点独立,也会是违犯条约精神吧!”^③由于李顿调查团的活动尚未结束,英国的这种态度对日本有一定压力。日本驻国联代表向东京报告说:“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此间空气……颇为神经过敏”,“李顿调查委员会是由于日本的提议而设立的,尽管目前即将触及问题的核心,但如果在这之前承认了满洲国,则将对日本的行动掀起责难和攻击……因此,至少在李顿报告书提出之前,应暂缓承认”^④。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到1932年9月初,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已定稿,并由成员们签名后,日本感到无所顾忌了,便于9月15日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与此同时,英国已明确了解决“满洲国”问题的主张。它认为,完全接受日军造成的既成事实,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对,危及英国在华的利益,也有损于国联和英国的威信和形象;而要恢复事变前的原状,日本肯定不会接受。有鉴于此,英国提出了所谓“面对现实”的解决办法:在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名义下,承认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英国外交部次官韦尔斯列在有关的备忘录中指出,日本在满洲

①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70页。

②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430页。

③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78页。

④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78页。

的地位与在上海不同,它在许多方面类似英帝国,比如像英国在马来亚的地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合法的解决办法。“我完全可以肯定,在纯粹司法的基础上,找不到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从法律角度讲,很难认为日本目前在满洲的条约权利的发展是合法的。但从道义和现实的角度出发,我倒要试问:在以前从没有与中国完全统一的省里,中国是否有理由阻碍它的更活跃更有进取精神的邻国的经济发展?”^①

随后,英国便根据上述主张操纵国联的活动,首先是对李顿调查团施加影响。上述主张形成时,李顿调查团还在中国。英国外交部便把那份备忘录转给驻华公使兰普森,指示他把上述意见转告李顿调查团(团长李顿本来就是英国人)。后来定稿的李顿报告书,便贯穿着英国的意见。

李顿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九·一八”事变乃日本蓄意发动,日军的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满洲国”不能认为由真正自发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另一方面,报告书认为,对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满洲为日本生命线”的主张,“可表同情,且能谅解”,中国人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根源。由于问题复杂,“恢复原状不是解决的办法”,“维护和承认满洲的现存组织,也是同样不适当的”^②。为此,报告书建议,东三省实行自治;维护日本在东三省及热河的经济利益;中日双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保证东三省的和平。

报告书公布后,英国感到,它的结论与英国外交部的观点“广泛一致”。实际上,它是英国“面对现实”主张的具体化,其姑息日本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供认不讳。10月2日,普拉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报告书对中国的指责“可能是更严厉了一些”,而“有关日本的许多可以说的刺耳的话却没有说”,“总之,报告书的结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尽管很难为日本所采取的方式辩护……但如果透过表面看到实质,那么是非的天秤是倾向日本的”^③。他还认为,报告书的出笼将产生如下效应: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日本看成是被告席上的罪犯,也不存在制裁或把它赶出国联的问题。

然后,英国便促使中日双方接受国联在李顿报告书基础上进行调解。中国国民党政府推行对外妥协政策,接受了李顿报告书;而日本却顽固坚持侵略政策,拒绝撤销“满洲国”,拒不接受李顿报告书。日本舆论一致谴责报告书,指责它损害了日本与国联的关系,并说国联在满洲的问题上并不比在印度问题上有更大的干涉权力。日本的态度给国联下一步的调解蒙上了不祥的阴影。现在,对英国来说,关键是要让日本改变态度。为此,英国不惜进一步姑息和讨好日本。

从1932年11月21日起,国联理事会开始围绕李顿报告书讨论远东危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发言时,对报告书中指责日本的内容进行了反驳。他说,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状况不同,所以外国军队才驻扎在中国领土上,外国军舰才停泊在中国领水内。他提到了20年代英美军队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尤其是1927年的南京惨案,然后指出,日本的行动与英美的上述行动在原则上如出一辙^④。的确,在殖民扩张、尤其是侵华方面,英日是一丘之貉。英国自己承认:“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在埃及的全部政策都将受到谴责。”^⑤正因为如此,面对松冈洋右的反唇相讥,英国代表“默默地倾听”,没有回击。

不仅如此,为了促使日本在“满洲国”问题上改变态度,英国还对日本竭尽姑息讨好之能事。1932年12月6日至8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讨论远东危机。许多中小成员国代表发言,强烈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主张不承认日本一手制造的“满洲国”,而英国代表西蒙发言时,却竭力为日本侵略扩张进行辩护。他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强调李顿报告书中指责中国的内容,把事变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头上,并表示反对制裁日本。西蒙的这种为虎作伥、助桀为虐的行为,甚至让稍有正义感的英国人也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就此评论说,西蒙“竟能在半小时内把他——松冈洋右在近十天来试图用半通不通的英语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⑥。国联大会经过几天辩论后,于12月9日决定,把“满洲国”问题提交

①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200.

② 陈绍贤:《中日问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第229页。

③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p. 201.

④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7~38页。

⑤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343.

⑥ 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第216页。

给由 19 个成员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处理。

英国虽然竭尽讨好日本之能事,却未能使日本丝毫改变其立场,仍然坚持维护“满洲国”的存在,并多次扬言,如果国联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就退出国联。这样一来,反倒使英国面临一种左右为难的选择局面:若不承认“满洲国”,日本退出国联,就会使这个本来就缺乏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进一步丧失威信和影响力。作为国联主要缔造者之一和主要操纵者的英国来说,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出现的。毕竟这个组织对维护英国的既得利益不无好处;若承认“满洲国”,则等于赞成日本对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的践踏,同样会有损于国联的威信和声誉,而且还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对,危害英国在华的利益,并会给其他国家的侵略扩张开绿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英国认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维护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的严肃性,比让日本留在国联内更重要。早在 11 月 23 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西蒙就指出:“我们应作为忠实的国联成员国行动,尽可能避免由于孤立的或突出的单独行动而招致指责。仅仅因为日本的意愿而放弃忠于国联及其原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对日本解释,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是亲国联,但不是反日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敌对的中国对我们的贸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① 12 月 20 日,他再次强调:“除了安抚日本外,我们确实不能走得更远”^②一些原来主张无论如何让日本留在国联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如普拉特便认为,与其使国联丧失尊严和原则让日本留下,倒不如让它退出国联更好一些。

由于英国态度明确,国联在起草远东问题的决议时并不顾日本的威胁。国联远东委员会在关于李顿报告书的决议草案中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都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对于违反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建立的“满洲国”,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表示承认。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大会以 42 票赞成、日本 1 票反对通过了上述决议。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了大会会场。英国终于没有像后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出卖中国东北。这是“九·一八”事变中英国远东外交与它在 1938 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的绥靖外交的不同之处。

实际上,英国和国联最终采取的仍然是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除此之外,英国就不愿意走得更远了。1933 年初,日本向热河发动进攻,于 3 月 10 日占领了热河全省。英国公众舆论强烈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输出武器。英国政府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应付舆论要求,但又担心日本报复。为了显示“公平”,2 月 27 日,英国政府宣布,对中日双方同时实行武器禁运。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视同仁的作法,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感。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西蒙到日内瓦出席裁军会议时发现,国际社会对英国同时对中日双方实行武器禁运没有任何表示赞成的迹象,英国完全陷入了孤立。于是,3 月 13 日,它被迫宣布取消武器禁运令。这一短暂插曲充分暴露了英国远东外交的软弱性。这种外交自然无法遏制日本的扩张。1933 年 3 月 27 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至此远东危机便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热河、扶持建立傀儡政权、退出国联和在扩张道路上一意孤行而告终。

显然,对英国和国联来说,远东危机的这种结局是英国远东外交和国联维护和平现状努力的失败。事实上,英国在是否承认“满洲国”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已经表明,无论它作出何种选择,都只会带来失败的结局。事态的发展清楚表明:仅仅在是否承认日本侵略扩张造成的既成事实方面作出选择,是制止不了日本侵略扩张的。“九·一八”事变中,英国远东外交及国联努力的失败,就在于它们停留在“不承认”政策阶段,而不敢再向前多走一步。

● 作者简介:赵 岚,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副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zhaolan688@sohu.com。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203.

②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364.